

朴学大师郝懿行的乡土底色

□孙明浩

郝懿行以《尔雅义疏》《山海经笺疏》等传世名著奠定乾嘉朴学宗师地位，一生治学浩博、声名远播，却始终将故乡栖霞视为最深沉的精神根系。其文其学，将桑梓深情沉淀为对乡众安危的真切牵挂、对乡土民风的自觉珍视、对地方文脉的默默守护。这份厚重的故乡情结，源于栖霞乡土的滋养与家族的耕读氛围。

郝懿行生于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，在栖霞生活40余年，乡土烟火与书香底蕴相融共生，塑造了他求真务实的治学品格，也铸就了他与故土血脉相连、终身不改的桑梓情怀。

古经”的治学路径深为近代学人推崇。章太炎讲学多次肯定《尔雅义疏》考据精深，其弟子黄侃更是盛赞郝疏晚出，远超前代《尔雅》注本；后世刘师培、王国维研究名物地理，均借鉴郝懿行实地勘察与文献互证的研究范式。郝懿行以栖霞山水滋养经学，以学术反哺乡土的治学路径，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学界，为地域实证学术研究树立了典范。

情寄乡众 魂归桑梓

郝懿行的桑梓情怀，不止于守护文脉山水，更根植于对底层乡民的深切共情。他一生留心乡野民生，记录灾异疾苦、褒扬乡土善举、批判苛政弊俗，以笔墨为民生立言、以学术守护苍生。暮年，他归葬故土，完成了一生魂系桑梓的赤诚告白。

栖霞地处胶东腹地，农耕条件艰苦，旱涝霜雹灾害频发，乡民常年靠天吃饭。郝懿行自幼亲近农事，深知农耕艰辛、民生不易。乾隆丁未年(1787年)，栖霞遭遇连年灾荒，先逢地震损毁农田水利，后续数月霖雨不绝，田间作物大面积倒伏腐烂，颗粒无收，乡邻流离失所，生计无着。彼时居家备考的郝懿行，日日奔走乡野查看灾情，实录民生惨状，以诗为史创作《霖雨十二章》。

诗作小序直言“为农人见忧而作”，开篇便以“雨无其极，伤我黍稷。神不其餗，民于何食？”铺陈百姓无粮可食、“室有储粟，食无宿储。老弱号寒，谁与衣襦”刻画老弱孤苦、饥寒交迫的民间惨状，并明确提出缓减赋税、体恤灾民的民生诉求。全诗纪实严谨，灾情时序、作物损毁、民生困境皆与《栖霞县志》相互印证，具备珍贵的“诗史互证”价值。此外，其《旱基》《农家叹》等诗作，亦持续聚焦旱涝虫害等灾害，字字饱含悯农忧民的赤子之心。即便身居京城，他仍时常询问家乡收成，始终心系故土苍生。

乡土之魂，在于民风良善、民淳俗厚。郝懿行格外珍视乡野凡人的德行光辉，着力记录无名乡贤的善行义举，以此教化乡邻、涵养乡风。《林翁补金》记载栖霞城西乡翁林复初，躬耕自持、乐善好施，佣人星荒得金，连夜奉上，林翁却金不取，直言非己之物、不可私藏，当依规上交。郝懿行由衷赞叹其高风亮节，称其虽不识字，德行却远超世俗读书人，充分肯定底层民众的纯粹善念。

其《乞儿五烈传》更是突破封建等级偏见，将守义乞儿与明末殉难的王氏五烈女合传立论，直言“孰谓卑田院中例居饿殍哉”，彰显品德重于身份、气节高于地位的价值追求，为底层小人物立传扬名、伸张正气。《峒崕山记》更是其为民发声的巅峰之作。民间长期讹传峒崕山盛产黄金，历代官府据此设金户、征贡金，逼迫乡民入山采矿，无数百姓深受其苦。郝懿行多次攀山踏勘、走访乡民、考证典籍，最终厘清事实：山中所谓“黄金”实为黄银，讹传始于隋代俗儒不实记载。他愤然痛斥：“甚矣，俗儒之误人也！”以一己之浅见，妄记无稽之说，竟令一方百姓数十年受其荼毒。”面对留存千年的误导残碑，他发出“此碑可毁，而今犹在”的沉痛诘问，以学术为利刃揭穿虚妄、控诉苛政、为民鸣不平，字字铿锵，成为守护乡众、心系民生的檄文。

道光五年(1825年)，郝懿行卒于京城户部任上，终年69岁。宦游一生，他始终未忘故土，临终再三嘱托妻子王照圆，他要魂归故乡。王照圆受京中家产、借助同乡之力，长途护送其灵柩归葬故土，将其安葬于城北金钩山腰——这片他眷恋一生的故土山水。墓冢形制简朴、青石为基，常年受乡邻守护，后被列为栖霞市、烟台市重点保护文物。

郝懿行毕生未竟的学术事业，由其子郝云鹄、孙郁联芬、郁联薇接续传承，两代人数十年苦心整理、校勘刊刻，汇编《郝氏遗书》30余种，既是乾嘉朴学的珍贵典籍，更是联结郝氏家风与栖霞文脉的精神纽带。

岁月流转，山河依旧。如今，郝懿行的桑梓深情、治学风骨、为民情怀，早已深深融入栖霞的山水草木、乡风文脉之中。暮色漫过金钩山，余晖映照简朴的墓冢，那位踏遍乡野、伏案校书、心怀苍生的栖霞学者，魂归桑梓，长存如，胶东群山巍峨屹立、如白洋河川奔流不息，生生不息、代代相传。



木棠

在清代宁海州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，曾涌现出一批极具个性的文化名人。他们虽身处不同的时代，却各自在历史的画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下面介绍的这四位文人，或守正、或执着、或洒脱、或孤高，他们以各自的人生轨迹，共同铸就了宁海州深厚而多元的文化底蕴。

孔尚先 恪守礼教，笃行儒风的圣裔

孔尚先，字绳武，号念蒂，清代宁海州东门里人。他的一生，无论是贫贱还是显达，始终将儒家的道德规范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，是儒家风范的杰出践行者。

孔尚先早年家境贫寒，常面临“粗茶淡饭难以下咽、衣衫褴褛难以蔽体”的窘境。但物质的匮乏从未消磨他的精神意志。他每天前往私塾读书，路经文庙棂星门时，无论寒暑风雨，必定停下脚步，整理衣冠，恭敬地行端拜之礼后才肯离去，一日三次，风雨无阻。这种对至圣先师的无限敬畏与数十年如一日的虔诚，正是他学问与品德日益精进的源泉。

在科举路上，孔尚先可谓顺风顺水。应童子试时成绩斐然，知州杨引祚对其大加赞赏；康熙二十九年(1690年)，他在顺天乡试中取得礼经第一名；康熙三十六年(1697年)高中进士，随后被选入翰林院担任庶吉士，后改任检讨，并兼任方略馆、典训馆纂修官。在翰林院期间，他勤勉敬业，诗歌深得李杜神韵，书法宗法颜柳，尤其在国书翻译方面造诣极深，每次御前考试皆名列前茅。康熙三十九年(1700年)夏，康熙帝在畅春园召试群臣，拟题“皇太后万寿无疆赋”。孔尚先见解独到，不仅获赐坐、赐食的殊荣，更得康熙帝亲笔临摹的董其昌“桃花每间杨花落”诗句，以及松花石砚和御书“远上寒山”的赏赐，一时轰动朝野。

孔尚先不仅学识渊博，更以德行为著称。在家庭伦理中，他将“孝”与“悌”演绎得淋漓尽致：对待继母如亲生母亲般敬爱侍奉；对待嫂嫂极为恭敬，遵循“长嫂如母”的古训，在家族内部营造了和睦和谐的氛围。这种对长辈的无可挑剔，正是他日后“修身齐家、治国平天下”的坚实根基。

步入仕途后，孔尚先将个人修养延伸至公务之中。康熙四十四年(1705年)，他受命赴广西主持乡试，面对官场陋习，他作诗自警，时刻提醒自己保持清廉正直，其凛然正气令同僚动容。当时的广西巡抚萧公(后官至相国)向来不轻易赞誉他人，唯独对孔尚先礼遇有加，感叹道：“此至圣裔，其行事自与人不同也。”康熙五十一年(1712年)，孔尚先赴山西担任学政。公务之余，他深入考察三晋大地的忠臣、孝子与义士，大力表彰道德楷模；引领士子始终坚持“德行为先”，极力阐扬忠孝节义的传统美德。

从少年求学时的虔诚端拜，到立朝为官后的勤勉尽职，再到视学典试时的崇本敦教，孔尚先始终恪守儒家的精神坐标。正如黄昆圃在其墓志铭中所评价，孔尚先年轻时便摒弃了浮靡文风，独尊经史，博采秦汉诸家之所长。他用一生向世人证明：真正的儒家风范，不在于高谈阔论，而在于日复一日的规行矩步与知行合一。

官卜万 视名如尘，毕生守护桑梓文脉

官卜万(1777年—1847年)，字寿卿，号香海，出生于宁海州照格庄村。他自幼聪慧过人，诗赋、书画、碑帖拓制无一不精，尤喜诗古文辞。然而，考取秀才后，他屡试不第。面对科考的失意，他并未沉沦，而是将目光从庙堂之高投向了江湖之远。他意识到，宁海古州是一片人文底蕴深厚的沃土，但在漫长的岁月中，许多珍贵的文化记忆正面临散佚。

临 散 佚



与湮灭的危机。若能挖掘、整理并传承这些桑梓文化，远比苦苦追求虚名更有意义。于是，他做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：“视一切富贵功名如野马尘埃”，以整理桑梓文献为己任。

官卜万文化生涯中最为人称道的壮举，便是历时三十年辑成的《牟平遗香集》。在走访中，他敏锐地发现民间散落着大量历代未曾刊印的诗词。他深知，这些先哲的著述、乡贤的文献，是宁海州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，通过一首诗不仅能了解作者，更能窥见彼时宁海州的山川风土、人情习俗乃至时事变迁。为了将这些瑰宝汇编面世，他穿梭于街村里巷、市井书肆，遍访豪门大户与文人墨客，千方百计收集名卿大夫乃至乡儒村樵、闺秀节妇的诗作。

从嘉庆十年(1805年)初稿完成，到道光元年(1821年)最终定稿，官卜万五易其稿，耗尽心血。这部共16卷的诗集，收录了从五代至清代118位作者的1352首诗词，取“遗香剩草”之意，名为《牟平遗香集》。这是牟平历史上收录人数最多、诗词数量最丰富的合集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他在每首诗前都附上了作者小传，持“不敢凭臆，亦不敢溢美”的严谨态度，使全书达到了人文互证、文史交融的高度。该书一经面世便广受好评，清代翰林院编修王懿荣盛赞其为“一人之诗，一身之史，亦一朝一时之史也”；清宣统《山东通志》亦评价其“持择颇精，足备文献”。《牟平遗香集》成为一幅幅历史文化画卷，保留了众多历史文化人物的重要信息，成为研究胶东东部地方史的重要文献，堪称牟平的文化经典。

如果说《牟平遗香集》是官卜万对乡土文学的深情回眸，那么编撰《宁海志书证证录》则是他对家乡历史的责任担当。他认为方志最能体现区域的历史文化底蕴，是历史留给世人的宝贵财富，而宁海州自明代以来三次修志，或因战火焚毁，或因修撰仓促而谬误甚多，且自康熙十一年后长达150年未再续修。官卜万对此念念不忘，在与挚友赵子轶修志的约定因友人早逝而落空后，他毅然决定独自承担这一重任。

面对亲属的反对和社会上“一介寒酸岂能修志”的质疑，官卜万毫不动摇。他避开官方修志的名义，转而编撰《宁海志书证证录》。在随后的30年里，他冒着酷暑严寒，踏遍牟平的山水村落，考察残碑断简，查阅诸子百家，最终在道光十八年(1838年)完成了这部40卷的巨著，并附带4卷《修志杂记》，对修志体例与史料取舍做了精辟论述。这部心血之作在后来的知州舒孔安重修《宁海州志》时，成为了最核心的蓝本，其价值可见一斑。

除了文字著述，官卜万对金石艺术也有独到贡献。崑崙山作为海上仙山之祖，历代碑刻林立。他深入山中，跋山涉险，遴选数十通极具代表性的碑刻，拓制成帖，编成《崑崙帖》。这部涵盖唐宋至清代千余年碑石文化资料的文卷，不仅展现了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，更保留了珍贵的历史信息。此外，他留下的《四香馆文集》《西园诗稿》《莱阳县志拾遗》以及《登州府志补遗考证》等多部著作，在胶东文化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。

木棠

旷达不羁，素心幽兰绘酒脱襟怀

木棠(字伯泉，号蒂村)，宁海州西油坊村人，是晚清胶东文坛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。

木棠先祖于清道光年间从云南丽江木府迁来，原为宁海望族，但到了咸丰年间木棠成年时，家道已然中落。然而，物质的匮乏并未磨灭他的才情与志向。据民国版《牟平县志》记载，木棠天性旷达不羁，自幼对诗古文辞有着极高的悟性，尤其在书画领域造诣颇深。他一生偏爱兰花，不仅是因为其“幽兰异众芳，任是无人也自香”的高洁品性，更是因为那素心皎皎、清幽袅袅的姿态，与他内心的精神追求产生了深深共鸣。凭借这份热爱与天赋，木棠笔下的兰花栩栩如生、气韵生动。他将内心那份旷达不羁、襟怀洒落的情感完美地注入每一株幽兰之中，成为咸丰年间的画兰名家。当时的文人雅士无不以能收藏一幅他的兰花图为荣。但他从未将绘画作为谋生手段，而是将其视为抒发胸臆和交友的载体，正如他在题画诗中所写：“生平殊少立锥地，信手兰花到处栽。”这种襟怀洒落的人生态度，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。

木棠的人生轨迹并未局限于书斋。考取贡生后，他被养马岛的一位黄姓道台聘为幕宾。借着外出公干的机会，他的足迹遍布南北各省。驻留广州期间，他结交了众多当代名士，其绘制的兰花也在岭南风行一时。这段壮游，栖霞名士林梦铎在《海邦志劄》中有所记载：“木伯泉，宁邑诸生，山左(山东在大行山之左，旧称山左——编者)名士也，少负义气，与京师燕赵同豪杰交游，南至金陵，周览大江上下诸名胜；年逾花甲，泛舟粤海之南，洪涛中挂帆弥月，有‘放怀古今失英雄’之句……”

游历倦极归乡后，山东巡抚崇礼特令宁海州聘请他为牟平书院主讲。在执教期间，木棠力主摒弃陈腐古制，大力变革学风，并倡导设立了“宾兴捐”，专门解决贫寒学子赴考缺乏资金的困难，这一义举深受当地士林的爱戴与推崇。

木棠一生著作未留稿，仅存《师竹山房诗草》一卷待梓。令人欣慰的是，他的艺术血脉得到了完美传承。子长鸿春(字少泉)书法超迈遒劲，孙儿嘉麟(字仁生)临摹《颜家庙碑》形神毕肖，且画兰深得乃祖真传。世人皆感叹木氏“三世无拙笔”。

杨玉相

一身傲骨，辞官归隐守耕读清贫

在宁海州东风凰崖村(现属乳山市)，曾走出过一位极具风骨的文人——杨玉相(字子瑜)。他自幼天资聪颖，才华横溢，在诗文书法上皆有极高造诣，青年时期便已文名大噪。清咸丰八年(1858年)，年仅18岁的杨玉相便考中举人；同治十三年(1874年)，他又高中进士，随后被任命为礼部主事，正式踏入仕途。

然而，杨玉相的官场生涯并没有持续太久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，戊戌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，却在短短103天后惨遭失败。光绪帝被幽禁，维新志士谭嗣同等“戊戌六君子”血洒菜市口，康有为、梁启超被迫流亡海外，慈禧太后再次独揽大权。目睹了这场政治风暴的全过程，杨玉相内心对慈禧太后的专权跋扈感到极度愤懑与不平。在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下，他毅然选择辞官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。

回到乡里后，杨玉相自号“半瓢散人”，过起了类似陶渊明般的田园生活。他变卖了家私和土地，将全部心血倾注于教育。他设馆授课，广收门徒，凭借着深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，吸引了无数求学者。当时，不仅本地学子慕名而来，就连百里之外的书生也纷纷背着行李、提着书箱前来求学。民国版《牟平县志》载：杨玉相“在本县中，最为老师宿儒，至今士林犹推重之”。

民国初年，杨玉相的得意门生吴佩孚已成气候。他仰慕老师的才识，多次恳请杨玉相出山任职。然而，早已看淡功名利禄的杨玉相，一次次坚决拒绝了学生的邀请。他不仅自己坚守清贫，还时常告诫子孙后代：“一不当官，二不经商，只做耕读之家。”

晚年的杨玉相专工书法与诗文，尤以草书见长，著有《观我堂诗文集》传世。他于92岁的高龄寿终正寝，用一生践行了淡泊名利、耕读传家的高洁志向，成为当地一段流传至今的佳话。

投稿邮箱:ytrbzk@126.com



光緒七年由順天府進呈皇帝御覽的郝懿行《山海經箋疏》一書封面。